

民国前期的边疆游记及其文化想象

——以云南游记为例

明飞龙¹

【摘要】 民国前期的云南游记大多描绘边疆的自然风貌、人情风俗、社会状况等内容,云南形象主要集中在“异域风情”及“落后”等定位上。从民国前期的云南游记来看,边疆形象是在各类游记中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所呈现的文化想象与边疆的真实面貌存在一定的差距。而讨论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能揭示游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能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展开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民国前期 边疆游记 云南游记 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2017) 12—0124—07

“边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本上作为“他者”存在于世人的想象之中,对它的叙述也大多来自各类游记。就云南游记来说,有元朝的《马可·波罗游记》、明代的《徐霞客游记》,近代有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洋》、古德尔孟《云南游记》、周伯熙《云南游记》、丁格尔《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熊宾《滇南壮游集》、士青《游滇纪事》、胡嘉《滇越游记》、谢彬《云南游记》、侯鸿鉴《西南漫游记》,以及刊发在《旅行杂志》等各类报刊上的游记作品。其中民国前期(本文指抗战爆发之前)的游记作品大多描绘了边疆云南的自然风貌、人情风俗、社会状况等内容,其中,“异域风情”及“落后”等基本上是对边疆云南的形象定位,不管在西方人笔下,还是在中原人(特指来自文化中心如京沪、江浙等地)眼里,边疆云南都是地理与文化的“他者”。这种“他者”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它与真实的云南是否存在差距?这种形象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发生变化?它们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同时,其变化背后的情感体验与文化想象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是否意味深长的关联?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一、游记与现实中的云南

民国前期的云南是以一种怎样的形象呈现在游记作品之中呢?落后是这些游记作品普遍的标记。“云南自然环境很好……但人民精神萎靡、文化落后……民众娱乐除吃、赌、嫖、抽鸦片烟而外,就如比较多的影戏院所演放的电影,也多属下流……使国民精神日益堕落!”^[1]“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2] (P40)}“在昆明五百个成年男子之中,至少有四百个是吸食鸦片烟的……据说在昆明有百分之八十的住宅有烟床的,他们横床直竹,吞云吐雾……这废民之国啊!”^[3]“堕落”、“文化落后”、“废民之国”等,可以说这是那些游记对此时云南的一种普遍性印象。云南经济上异常贫穷。在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条滇越铁路就把整个云南经济与交通把握到法国手上……这一张一张纸(法币)不断地流入云南使二十倍于滇币地把云南银换了去……实际仅值十分之一的币制之下……云南实在太穷了,穷到不成样子。”^[3]

经济上是这样,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山国里的云南,什么都是落后,说到负着指导社会的文化事业,也是沉寂可怜。”^[4]文学的贫乏是其文化落后的一种突出表现。虽然云南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经济原因,她整体上是落后的。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重点学科开放招标项目

作者简介: 明飞龙,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西赣州 341000)

有论者这样写道：“说到云南的文艺，那要可怜得使人气叹！这也当然是它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命运……尤其以经济上的控制……就算‘权力’不压迫你，也怕你不敢大量去出版一个什么‘刊’，莫说要求刊物是进步的。”^[5]文学观念也是如此：“五四运动后的云南青年文学思想虽已进步，但是缺乏重心，思想动摇不定……青年拒绝空乏的文学思想而没有新的思想接替，空虚无聊的文学思想依旧存在，而且混乱和浅薄的夸大更甚。”^[6]读者的阅读趣味则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其文学观念与时代的差距：“至于看的书呢，凡是文学书，尤其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剑侠小说，书目总被人翻烂……至于书报是例外被人欢迎的，没有一本不是翻得很旧的了，因为上面有姑娘漂亮的脸子和一对胖腿……”^[7]这一切都表明，云南与上海平津等文化中心相比，是远远落后的。

这种“落后”是事实，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想象。“一说到云南，在沿海一带人们的脑筋中，就会浮起一种遍地不毛愚昧野蛮的想象，以为那里的文化不知落伍到什么程度；至于当地人，也许是遍身长毛，或者还有尾巴……”^[8]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在他们看来，云南都是“异邦”。“予游历云南全省，观其政治社会道德神教一切情状，与沿江沿海各省，截然不同……予游历至此，恍若置身于二千年之前矣。”^[9]这样的描述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游记文字之中，在这些文字中，云南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就是“原始”、“野蛮”、“落后”。

其实云南也有并不“原始”、“野蛮”、“落后”的一面。滇越铁路开通以后，昆明就逐渐繁华起来，金马碧鸡一带“百货荟萃，人烟辏集”。文明也有新气象：“近来滇省新人物辈出，或游学自海外归来，或服官自他省返里。舍其旧有朴实之风而沐新学文明之化。”^{[10] (P125-126)}尤其是龙云执政以来，云南更是出现了新气象，有人描绘抗战前夕云南女子的精神面貌：“少女则不然，脚大步大，走来煞是雄迈，颇有西洋女人风度。间亦看见一般少女，易袂为弁，穿长衫戴礼帽，或着西装，为他处未尝见到的。又常见一般女兵……远看与男兵无异，挺胸阔步，气宇轩昂。”^{[11] (P196)}除了其精神面貌呈现出不同于“惰性”的一面之外，有些数据则能说明其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比如教育。有观察者这样评价：“昆明的教育并不落伍，全市小学约有七八十所，就学人数也达二万左右，约占昆明全市的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在文盲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国里不能不算是一种好现象。至于社会教育也很发达，像图书馆，阅报室等推广社会教育的机关也不少。

这种现象是别处所少有的。”^[12]社会文化机构如图书馆，抗战之前云南有 105 个，比全国最多图书馆的广东省虽然还少 249 个，但在全国，云南仍占第 8 位，从数量上来看，是不落伍的。^[13]在昆明，逐渐形成一种比较浓郁的阅读氛围。“阅览室（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的阅览室——笔者注）一再扩充，阅览时间延长，从上午八点到夜间九点，中间不休息，读者经常满座。儿童阅览室每日阅览儿童亦极踊跃。”^{[14] (P221-223)}“昆明现已办有巡回文库两具：一为车式，一为箱式……现闻此两文库，每日均满载而出，归来皆空空如也。”^{[15] (P117)}云南青年对文艺也是非常热衷的：“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图书馆新旧书籍一万八千四百余部……学生阅书兴趣多嗜文学方面……”^{[16] (P90)}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则“故事”：

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吃茶的地方遇到两个瘦瘦的青年，一个养长了头发，一个没有戴眼镜，却常常说眼睛近视，看人似乎故意有点不方便。经朋友介绍后，知道是常常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作家。互相寒暄一下，他们便说一阵中国如何地没有作家和云南如何缺乏人才这一类的话，他们后来似乎看得起地问我：“你在上海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我也不无惭愧地说：“没有发表什么。”他们好像很失望，为我抱歉似的，随即站起来要走，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说：“我们要去寄这封信，这信是我俩写给沈从文的……”^[17]

针对云南青年对文艺的“过度”喜爱的现象，有人甚至撰文进行批评，认为：“在云南这样的环境中，青年们文艺兴趣极其浓厚，同时似乎有一种不天天读文学作品就不是现代青年的趋势，就这一点看去就已经是错误的了。”^[18]不管批评者的观点如何，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有其并不“原始”、“野蛮”、“落后”的一面。

二、游记中的文化想象

上面所涉及的这些方面（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比较发达，读书氛围的日益浓厚，云南青年对文艺的喜爱等）却很少出现在相关的游记文字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意味的话题。在晚清以前，作为西南边疆的云南，外界对它的了解大多来

自使臣、军人、贬谪的官员、流放的罪犯以及偶尔经过的旅人等人群的描述。他们来到这边疆之地,首先感受到的是关山重重的艰难及异域文化的反差,尤其是那些被贬或流放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把自己看成不幸者。有论者这样描述那些西去和出塞文人的心理世界:“‘故乡在远方’的西去和出塞,便成了一条刑罚之路、一条流放之路、一条冒险之路、一条避祸之路,一次离开故地的‘失根’之旅。”^{[19] (P26)}可以说,大多数“南迁”云南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他们的描述很可能与客观现实存在差距,因此考察关于云南的描述,不能忽视描述的历史语境,这些言说是谁在言说,面对谁言说,言说的内容是什么等,都是不能忽略的。那些身份、背景、心理世界各不相同的外来者初到云南时不可能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们基本上是以一种单向度的方式来描述,不可避免以中原文化的眼光来打量这片“蛮荒”土地上的人与事,不适之感也就油然而生,再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与远离亲朋的思绪,乡愁也就自然而然地弥漫于心头。

这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眼光是由他们所浸染的中原文化所塑造的。正如萨义德所说:“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这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所塑造。”^{[20] (P72)}就如前文所述的那些关于云南印象的不同文字,无疑,这种“描述”与“真实”之间是存在差距的,而大量呈现关于其“落后”的文字也就在不断地固化着人们对它的印象。葛兆光在分析旅行游记中的异域记忆时说:“关于异域蛮族‘非人’和‘野蛮’的故事,常常并不来自异域的观察却来自本土的想象……挟着本土的想象去看异域的生活时,总是把一些恐怖怪异、不可理喻的事情附益在自己并不熟悉的空间里。”^{[21] (P76)}对于大多没到过云南的人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云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历史和地理名词,他们对云南的印象是渗透了观察者自己的偏见和想象,当然也蕴涵着他们的启蒙立场。因为经济、文化等诸种原因,民国前期的云南内部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缺少这样的机会,因此“云南形象”基本上是外来者叙述与建构起来的,云南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而这种叙述与建构又与前人的叙述与建构有关,“落后”、“野蛮”等早已隐藏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再加上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和孤寂寥落的心情,云南那种“落后”、“蛮荒”的印象就被进一步强化。

其实,不管这些游记中的云南形象是否真实,都只是他们包含着文化与情感、主观与客观因素的个人感受,是一种对文化“他者”的表述。就如法国学者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自觉意识当中。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22] (P155)}同时,“他们作为旅行者的相对地位是对‘置身于外部’的观点的确认,同时,也提供了地理学中的知识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历史先例”^{[23] (P170)}。在某种意义上,“云南形象”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那些个人感受的文字经过内地尤其是上海那样报章发达的地方不断传播后,这种“个人感受”就逐渐变成了“一般性知识”而沉淀在国人心里和社会舆论之中。

它的背后是一种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式”的观念与想象。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真正生活在云南的人们基本上没有机会阅读这类游记作品,因此也就很少有机会传达他们的心声。也就是说在“云南形象”的传播过程中,真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是“沉默者”。于是,在这样话语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化想象”的“个人感受”文字就演变成“真实”的“云南形象”,可以说这种形象在抗战之前的几十年间一直存在于对云南的叙述之中,不断地强化着云南的形象,并逐渐成为一种富有意味的“风景”。而“当风景和自然与某一体环境融为一体时,这种环境并未停止负载与自然有关的价值意义和规范意义。相反,这些意义变得更加自然,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再源于某一主体、某一作家或艺术家创造的艺术景色,而是来自客观现实本身”^{[24] (P29)}。因此,云南落后与蛮荒的“风景”也就具有某种“价值意义”与“规范意义”,于是,在对云南的不断叙述中,那些也许是文化想象的“风景”也就成了客观现实。

从前文的相关叙述可以看出,在民国前期对云南的描述中,不管是外国旅人还是京沪游者,因为“知识权力”,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吧云南当作“他者”的形象来描述与建构,对云南的异质文化所呈现的民情风俗与人文景观很少持赞美之情,对云南民众也缺乏同情怜悯之心,言语之间时常流露出一种鄙视之意,诸如:“看街上那到处乱跑的猪和牛,还有那黑瘦黑瘦的打着哈欠的男子(抽鸦片之故),你以为是走进了非洲的某个部落,还有那散发出臭气的石板路,简直让人无法忍受……”^[25]这类文字时常可见,这些游记文字也往往因为作者标榜的“亲历者”记录而使人们“信以为真”。其实“这些本来应当是实录的东西,由于作者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常常把原来习得的记忆和资源带进自己的记录中,所谓‘耳听为虚’常常会遮蔽‘眼见为实’,特别是他们对异

域之‘异’的格外兴趣,总是使他们的旅行记不由自主地把‘实录’变成‘传奇’”^{[21] (P71)}。由此,那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建构起来的文化想象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云南的不良印象,误解便日益加深。

云南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这类文字会对云南产生不良影响:“有不少内地人尤其是京沪等地的考察团或私人来滇旅行考察,但在一些杂志的文章里经常读到一些游记,他们总爱拿昆明与北平上海相比,然后进行批评,这对云南来说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也是不公平的。”^[26]作者认为,不能把云南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无限夸大,从而使人认为云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包袱、一个被人嘲笑的谈资。虽然云南与京沪等地相比是落后的,但应看到它的变化、它的向上的风气,以及它在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等。有的论者则对国人看待边疆的文化心理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心理会使之忽略边疆问题:“国人数千年来之传统思想,即为自尊自大。在鸦片战争以前,国人恒视外国为‘夷狄之邦’,关于外人知一切,均以为不足注意。国人更将此种错误心理加诸边疆之上,以为边疆文化低落,一切落后非若中原富庶之区、全国文化中心也。国人对边疆既有如此心理,故以为边疆问题未有注意与研究之价值也。”^[27]认为不应该以各种文字来渲染云南的落后、愚昧等,而要关注云南地理问题,要把云南放在全国的重要战略地位来评价,从而为云南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由于边疆危机的步步紧逼,外来知识分子对云南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在他们的游记作品中,不再像前文所叙述的那样来描述它,不再把它视为中原的“他者”,而是把它看成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并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如果没有别的事牵掣,我将集中精神依照我原定计划来经营滇桂,我将以滇桂作复兴中国的支哥拉,我将在滇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山国,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山国!”^[31]他们在此也发现了“蓬勃的气象”:“其实昆明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片荒芜……可以看到很多有朝气的、健步行走的年轻人,他们似乎感觉到这个时代在逼着他们。”^[28]这是由于边疆危机(此时日本已占领东三省)引发的民族国家危机在国人心中产生的思想情感的震动,是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地理表达。

云南本土人士也对在描写云南人时经常提及的“萎靡、慵懒”的精神状态进行批评,号召要发扬“护国”精神,在国家危机四伏的年代,在国人面前树立良好形象:“我们认为这种软及糖的惰性、黏液性,是不适于时代需要的。我们如何发扬固有的‘南方之强’及‘护国’之精神,唤醒与组织广大民众来参加这一次的战斗,塑造云南新形象,成为我们亟待承担的使命。”^[29]在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发现叙述的语气已经有了变化,变得客观理性一些,那种充满偏见的夸张已消失,还蕴含着对云南未来命运的忧虑。游记不再是单纯的景物与心情描写,云南的地理位置、文化教育、精神面貌等已经成了他们游记的主要内容,一种新的云南形象在期待与建构之中。

有学者指出:在旅行过程中,时间与空间有着复杂的意义。时间维度在旅行文学中常常会切入历史层面,构成旅行家自身的传统时间层面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层面的纠结。空间的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而且有人文环境的巨大反差。现代性体验就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产生。^[30]论者在文中指向的是晚清国人的海外旅行。其实,自晚清以降,那些边疆游记,不管是西北边疆游记(如新疆游记)还是西南边疆游记(如云南游记),都同样在“巨大的反差中”蕴涵着一种“现代性体验”,只不过这种体验是在对作为“异域形象”的边疆“观看”中强化的。

让·马克·莫哈认为,异国形象有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是按照自己的社会模式、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把形塑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投射到作为他者的对象上,通过消解、同化他者让其适应本社会的价值观。^{[31] (P31-35)}无疑,“边疆”的“异域形象”是“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对“他者”的观看与想象。旅行的过程就是一个“观看”的过程,人们旅行中的先在经验与切实体验将直接影响着“观看”,也就是游记内容的叙述,其背后都呈现着旅行者的自我文化形象。正如巴柔所说:“在游记中,作者——旅游者叙事的生产者、叙事的主要对象、叙事的组织者和他自己的导演……他在异国的舞台上扮演了自我经历的主人公,而他自己又是这一经历的最佳编年史作者、专栏编辑兼土地测量员。”^{[32] (P146)}在前文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云南游记在旅行者个人的“组织”、“导演”下,逐渐成了集体想象的产物,同时又成了社会集体想象的创造者,由此而不断强化民国前期云南的“他者”形象。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峻,新的云南游记则进行着新的集体想象与文化建构,其作为战时中国的“民族复兴根据地”逐渐成

了这些游记所努力塑造的形象。随着抗战爆发,平津及沿海等地知识分子的大量内迁,云南遂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根据地,昔日游记中“落后”、“野蛮”、“病者”等逐渐被“战斗堡垒”、“抗战建国根据地”等代替。这种不同的游记书写及其文化想象无疑是被不同的“想象云南的方法”及时代环境、文学文化氛围及旅行者新的情感体验所左右。其他民国前期的边疆游记也可作如是观。比如在同一时期的新疆游记里,我们时常能看到类似的文字:“在回顾无人烟之区,往往感到莫名其妙之空虚。有时在沙漠中见到一只羊,一棵树,都觉得非常之可爱,获得一种无上之安慰。但是在一刹那间后,又引起水火盗贼之恐惧……当此塞外冰雪胡马悲鸣,旅行之艰,真有万千语无从说起之感。”^[33]而抗战时,同样的哈密风光,在旅行者的笔下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镜像,连哈密瓜都被“战士化”:^[34]“哈密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一晴似洗,万里无云……土地肥沃,农产品必备,恍若置身华北平原,人民安居乐业,诚世外桃源也……自抗战以来,为清季贡品的哈密瓜,被源源输往抗战前线,成为抗战的一份子……”

三、结语

这种边疆游记所呈现的情感体验与文化想象的变迁,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内涵中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些边疆游记是旅行者对边疆的认知和感受,这种认知和感受是以直接体验为方式,以旅行者自身的文化观念为基础,通过书写和阅读的集体行为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想象,也是文化共同体的一种观念投射。这类边疆游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想象与观念投射中,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旅行者的主观精神世界。其实,现代中国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旅行者”,他们的创作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游记”。“乡土中国”、“洋场都市”、“异域边疆”可以说是三个基本的“旅行空间”或者说文学空间,在这些空间里,他们所感知的景观与主观精神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纯粹的景观,也没有纯粹的“旅行”,这些“游记”所蕴涵的文化想象以及游记传播所造成的受众文化想象都是“景观”主体化的结果。这些文化想象通过各具特色的文字编码实现其外在形象与内在观念的传播,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化想象、外在形象与内在观念。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也就在这样的碰撞与对话中逐渐展开。“云南游记”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民国前期的边疆书写,我们会发现,“旅行者”话语通过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想象,突出了“边疆书写”对应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并赋予这些游记作品一种鲜明的创作姿态,使边疆也使文学自身向未来过渡。在现代文学的文化语境中,“边疆书写”总是与启蒙、救亡等情感基调及时代意识有着内在关联,它和“洋场书写”、“乡土书写”一样牵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对应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并清晰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书写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边疆书写”无论是作为叙述场域,还是作为文学意象,它都具有相当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深度。

参考文献:

- [1]杨鸿烈.本省师范学院之使命[J].云南教育行政周刊,1932,(13).
- [2](美)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M].李希文,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萧一平.滇越桂漫游记(三)[J].女青年月刊,1936,(10).
- [4]竹溪.云南的文艺界[J].读书月刊,1931,(6).
- [5]丹菲.云南文艺漫画[J].出版消息,1933,(24).
- [6]李正渤.过去云南青年思想之一瞥[J].天南,1933,(3).
- [7]冷眼.昆明图书馆印象记[N].云南日报,1935-07-18.
- [8]李启愚.昆明风光[J].旅行杂志,1936,(2).

-
- [9] (英)丁格尔. 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自腾越至新街[J]. 陈曾谷, 译. 东方杂志, 1912, (5).
- [10] 士青. 游滇纪事[M]. 上海: 中华书局, 1924.
- [11] 向尚, 李涛. 西南旅行杂写[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7.
- [12] 田家汉. 南行杂集·返粤途中话云南[J]. 礼拜六, 1937, (9).
- [13] 张鸿书. 图书馆巡礼[J]. 云南旅平学会季刊, 1935, (4).
- [14] 于乃义. 云南图书馆三十年见闻录[A].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七) [C]. 昆明: 政协云南省委员会, 1965.
- [15] 谢彬. 云南游记[M]. 上海: 中华书局, 1924.
- [16] 侯鸿鉴. 西南漫游记[M]. 无锡: 锡成印刷公司, 1935.
- [17] 韬哲. 故乡谈屑[J]. 滇声, 1934, (1).
- [18] 陈金灿. 云南学生醉心文艺的错误[J]. 天南, 1933, (2).
- [19] 丁帆.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0] (美)爱德华·W.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21]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2]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形象[A].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3] (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4] (美)温迪·J. 达比. 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 张箭飞, 赵红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25] 青萍. 昆明街头[J]. 天南, 1933, (4).
- [26] 程诚秋. 怎样看云南[N]. 云南日报, 1935-07-19.
- [27] 艾朝楷. 我人对于云南之认识[J]. 滇声, 1935, (2).
- [28] 依. 昆明印象[N]. 云南日报, 1936-12-17.
- [29] 武尚贤. 本刊的使命[J]. 南强, 1936, (1).
- [30] 周宪. 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J]. 社会科学战线, 2000, (6).

[31] (法)让·马克·莫哈. 试论文学形象的研究史及方法[A].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2]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3] 雨生. 新疆旅行记[J]. 天山, 1934, (1).

[34] 越挺. 新疆风光[J]. 读者, 1944, (2).